

宋初波治探研

张其凡 著



封面题字：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
前安徽师范大学校长
张海鹏教授

ISBN 7-81029-406-7



9 787810 294065 >

责任编辑：严奉强

封面设计：山内

ISBN7-81029-406-7

D·18 定价：18.00 元

宋初政治探研

张其凡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宋初政治探研

张其凡 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5万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1029—406—7

D·18 定价:18.00元

卷首语

本书收集了笔者10余年来刊发的论文14篇，按论文性质，分为四卷。

卷一，集中讨论了宋初的中书事权问题。所收三篇文章，写于1980—1983年间。在本卷中，笔者对传统的“宋初相权削弱”说进行了批驳，指出在宋初并未采取过一系列削弱相权的措施；同时，笔者亦不以宋代相权重于皇权说为然，认为“共治天下”乃最恰当的形容。围绕这一问题，宋史学界不少同仁亦撰文以抒己见，并在1985年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展开过热烈讨论。这三篇文章，集中反映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卷二，考察了宋初的几项政策，着重于宋初的法制建设。关于宋初的经济政策，笔者不能认同对宋初统治者的指责。笔者以为，宋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是由经济生活的现实而非统治者的意愿确定的。笔者以为在宋初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中，法制建设是最为重要的。在相关的两篇文章中，笔者不仅考察了宋初法律条文的制订，而且考察了执法者——官吏的选任、考察问题。

对于宋太祖朝的用人，笔者指出，不仅是重用文臣，更侧重于重用有吏治才干的文臣，因此，造成了宋代文人学习法律的热潮。

卷三，考察了宋初三朝的政治演进状况。笔者认为，宋代积贫积弱局势的开端是宋太宗时期，到宋真宗“天书封祀”闹

剧后，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笔者还指出，宋初三朝，黄老思想流行，为政的黄老色彩很浓厚，这在政治上有利亦有弊。

上述三卷中的观点，多数是笔者在大陆宋史学界较早提出的，有些且已为宋史学界大多数人接受。如宋初流行黄老思想问题，笔者在1982年提出时，反对者居多，而今已为多数人接受。有些观点迄今仍有争议，尚未能成为定论，如宋初相权问题，但笔者之说自成一家，引起了宋史学界的注目。因此，上述三卷中的文章，可以说是反映了笔者10年来研究宋初政治史的主要心得。现将有关论文汇编为三卷，并略加润色，刊发时有删节者据原稿，以使笔者之说能够更为集中地反映出来，同时也期待得到宋史学界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所谓“宋初”，盖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也。这是根据笔者对宋代政治史的分期而言的。笔者对宋代政治史分期的见解，详见本书代前言《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一文，此不赘述。

本书卷四，则是笔者对《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两部极为重要的宋代史籍点校本的意见汇总，希望能对使用这两部史籍的学人有所裨益。

1993年9月于广州暨南园羊城苑

目 录

卷首语	(1)
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代前言)	(1)
卷一 中书事权	(19)
宋初中书事权初探	(21)
三司·台谏·中书事权	
——宋初中书事权再探	(44)
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	(62)
卷二 宋初诸政平议	(69)
宋初经济政策刍议	(71)
试论宋初的法制建设	(80)
宋初择人用吏述论	(93)
试论宋太祖朝的用人	(109)
卷三 宋初政治之演进	(127)
从高梁河之败到雍熙北征	(129)

雍熙北征到澶渊之盟	
——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一·····	(148)
吕端与宋初的黄老思想·····	(169)
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	
——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	(198)
卷四 史籍校勘·····	(257)
《宋史》点校本质疑(82则)·····	(259)
《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二至六册献疑·····	(287)
《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七至十二册校读志疑·····	(311)
后记·····	(353)

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

（代前言）

要深入研究宋代政治史，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大势和走向，就不能不对宋代政治史进行分阶段的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明了宋代政治史的分期。以往，对此问题似乎尚无人专门论述。今不揣浅陋，谨就两宋政治史的分期问题，试陈管见如下，以就正于历史学界同仁。敬祈批评指正。

—

综观两宋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明显可以看出，北宋和南宋时期的政治有很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面貌。因此可以说，北宋和南宋的划分，不仅仅是以首都所处地域的南北来划分的，同时也具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贯穿北宋政治的主线，是危机与变革；而贯穿南宋政治的主线，则是生死存亡之争。正是政治主线的不同，因而使南、北宋时期的政治，呈现出大不相同的面貌。因此，作为第一步分期，可将两宋时期的政治史，划分为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

（一）

北宋时期，自公元 960 年到 1127 年，共约 170 年之久，

先后有9个皇帝。纵览整个北宋时期的政治，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期。无论政治上如何变化，都不影响中央集权统治的稳固，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国家各项制度的实施，是比较好的。

北宋时期，皇权的崇高地位，无论从形式上或实质上，都得到了保证。对北宋皇权之盛，论者颇多，众所周知，兹不赘述。然而，由此出发而持“相权削弱说”，则笔者不能赞同。

北宋时期，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从理论上，他们认为，“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①从政体上，他们认为，“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政令当出中书，陛下审而行之，人主操柄，无要于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②他们感到，国家的盛衰，与自己息息相关；维护和治理国家，不仅是皇帝的责任，更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以天下事为己任，对国家大事，必直抒己见，章凡数上，争辩不休，激烈交锋，蔚成风气。北宋的士大夫，有知识，学法律，明吏道，对国家大事的认识，有一定深度，故言事多能切中时弊，从而增加了他们对于国家大事的兴趣和干预的信心，于是更积极地投身于政治论辩之中。北宋又有一条习惯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这又增加了他们参政的勇气，使其减少了后顾之忧。北宋时宰相之得任职，不是凭门第，主要是凭一己的才干，故而一旦去职，即不能再予政治以多大影响了。而宰相的进退之权，全操于皇帝手中。是故相权虽隆，终置于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凌压皇权而呈宰相专权之势。北宋时专属皇帝遴选的，除宰相外，还有台

谏。台谏的权势，在真宗以后日盛。“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輿，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谋也”。^③台谏势盛，士大夫言事成风，既限制着相权，也制约着皇权，使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代表面，更为宽广，从而也使北宋的国家统治，更为稳固，整个政治呈现出比较清明的气象。^④“共治”局面的恶果，则是因政治危机而引发改革与反改革之争，从而出现长达百年的党争。

宋初三朝，由于时代和政治的需要，黄老思想流行，政治上实行“黄老之治”由此使民众得到休息，国家和社会得以稳定。但随之而来的是，因循缄默之风蔓延，政治弊病不能及时得到改革和根除，以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⑤真宗时“澶渊之盟”的签订，解除了宋朝的“北患”，遂更加剧了因循缄默之风，终致出现了“天书封祀”的大闹剧，举国上下，昏昏然，纷纷然，劳民伤财而自鸣得意。到仁宗时，宋夏战事趋向激烈，宋军连遭失败，西夏日益强大。加之国库虚耗，财政支出日益浩繁，危机感在士大夫中日逐流行，“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⑥于是，“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继而起，意图有所变革，挽救危机，由此引起朝野骚动，遭到因循守旧的强大习惯势力的反对，士大夫竞相诋毁，“朋党”说兴，新旧党之争日趋激烈，终于，新政和变法都归于失败。在党争的余波中，金国的军队南下，北宋皇朝宣告灭亡。^⑦

(二)

南宋时期，自公元 1127 年至 1279 年，共约 150 年时间，先后也有过 9 个皇帝。

南宋政权，诞生于宋金战争的烽火中。南宋皇帝，均未经多少磨难历练。高宗稍经战火洗礼，且因在动乱中具有政治上正统地位之号召力，因而在其统治期间，皇权尚能控制局势，与北宋皇权之重一脉相承，虽有权相如秦桧，得志一时，但终未能改变局面。孝宗以宗室入继大统，虽挟人心之所仰望，但本身并未经过磨难和历练，且南宋政权其时已稳固确立，故其权力之基础即不如高宗。孝宗以恢复为号召，宠信内侍、佞幸，均与其欲提高皇权威望有关，而且也确有成效。光宗即位后，与孝宗父子间渐至不和，固拒大臣之谏，实已显示皇权高涨之迹象。但光宗刚愎自用，导致统治危机，终被废黜，另立宁宗，从而抑止了皇权上升的势头。史弥远诛杀韩侂胄，函首金营求和，而宁宗竟无如之何，表明权臣之势已压倒皇权，从此开始了权臣掌权时期。宋代权臣与皇帝相比，没有天然的权力基础，执着于权力的独揽以确保其地位，故而控制台谏，顺昌逆亡，甚至废立皇帝，以保其位，因此使政治不能不走向黑暗、腐败。随着权臣的死亡或下台，又会引起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最高统治阶层内，常无宁日，直至南宋灭亡而不休。

南宋政权，前期面临金国的威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后期，又面临新兴的蒙元帝国的进攻，勉强支撑了数十年而终于灭亡。腐败的内政，黑暗的政治，使南宋国家机器从来没有像北宋那样稳固运行，虽然经济发展超过北宋，但国力和军力则

不行，对金、元作战始终处于下风，使南宋 150 年历史的主线，成为生死存亡之争。

二

整个两宋政治史，大略分为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殆无疑义。时下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是如此处理的。但具体到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中的分期，则似乎尚无人专门论及。下面，拟重点讨论北宋和南宋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先述北宋时期。

记述北宋历史的由宋人编纂的国史，据记载，共有三部：1. 《三朝国史》，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2. 《两朝国史》，记仁宗、英宗两朝事；3. 《四朝国史》，记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事。三部国史的纂修，似乎在向我们昭示宋人对于北宋政治史分期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笔者以为，按三部国史，将北宋政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是比较适当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 62 年，为北宋前期；仁宗、英宗两朝 45 年，为北宋中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 60 年，为北宋后期。这三个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面貌。

(一)

前期三朝，既是赵宋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北宋政治危机的酝酿与成熟时期。

北宋大臣富弼说：“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到仁宗时，“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①宋

人的这些议论，无疑揭示了这一点：北宋的各种制度，主要创自太祖时期，经过太宗、真宗两朝，遂呈完整、系统、定型。例如，禁军统帅机构由五代的两司——侍卫、殿前司演变为三衙——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是到真宗时才完成的；当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一职不再除授，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完全分开，殿前司稳居三司之首，三衙体制才告成立。掌管一路的都转运使之职，始置于太宗端拱元年（988）十月，而路、州、县三级体制的完全确立，则是在真宗时。太宗淳化元年（990）十二月，正式定制，中书掌政，枢密管军，三司主财，中央三大机构的大致权限，正式有了明确分工；到真宗时，不仅中央政府权力三分，台谏权势又复上升，首开劾罢宰相之先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分立之势，已见端倪。

从思想上看，宋初三朝盛行黄老思想，提倡循谨缄默，无所作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政治危机。

从政治上看，由于太宗继位之谜而引起的皇权递嬗的危机，在太宗时期导致数起事端。太祖两子——德昭、德芳不明不白死去，太宗之弟廷美被迫害致死，太宗长子元佐佯狂被废，太宗次子元禧死后追贬。于是，朝野内外，人心郁闷，危机重重。太宗立第三子为太子后，受到京师人的欢迎，太宗却疑心大起，几致不能自持。真宗即位后，在托孤重臣吕端等黄老思想浓厚的大臣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定皇室，安抚大臣，收拢民心，好不容易扭转了太宗末年的危局。^⑤“澶渊之盟”的签订，又使五代以来即常令中原王朝头痛不已的北部边患解除。赵宋皇朝的内外交困局面，都大大缓解，呈现出一派安定和平的景象。宋真宗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五个年头起，大演“天书封祀”之闹剧，举朝上下，如颠如狂，正

直如寇准之类的大臣，亦不免卷入其中。究其缘由，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坚固基础，然而，也正是“天书封祀”闹剧，使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高粱河之败”以来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终至完全不可挽回，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危机，已然到了必须挽救的地步。

（二）

中期两朝，是北宋政治改革的酝酿和尝试时期。

“天书封祀”闹剧和真宗晚年的昏愦病，使宋太宗以来的军事、财政危机积重难返，因此，“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进行变革，挽救危机，成为朝野士大夫的共识。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挺身而出，提出了各种见解，并开始付诸行动，以图挽救危机，重振赵宋皇朝。

从政治架构上看，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相互制约，使政治上呈现宽松局面，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从思想方面讲，这一时期，是百家争鸣的局面，黄老的“无为”思想，被一致摒弃，各种思想流派兴起，都以重兴儒学、挽救天下为己任。其中，以三个人影响最大：范仲淹以身为率，力振士风，一改宋初以来形成的循默之士风，在振作人心方面，功劳最大。欧阳修主盟北宋中期文坛，大张古文运动，一改宋初以来的颓靡文风，在文学改革方面，影响最大。周敦颐在哲学方面贡献甚大，开创了后世理学的先河，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尤为深远。^⑩

士风、文学、哲学方面变革的成功，使政治改革有了基

础，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有“庆历新政”的政治改革出现，但为时甚短，昙花一现，仅仅成为一次尝试而已。

在仁宗时期，宋夏战事趋于激烈，宋军屡战屡败，先后有三川口（1040）、好水川（1041）、定川寨（1042）三大败仗，损兵折将以万计，充分暴露了宋军的迫切需要整顿，军事制度的迫切需要改革。“庆历新政”的失败，使军事改革无法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又使改革的必要性更加突出。

英宗以藩室而入继大统，时方 32 岁，但即位未几，即以 36 岁的英年早逝，未能有多大作为。他把帝位留给了儿子神宗。神宗即位时年方 20 岁，年轻气盛，正当有为之年，遂演出了一场改革大剧。从这一点上讲，可以说英宗时期为神宗改革做好了准备工作。

（三）

后期四朝，是政治上的改革与反改革时期，到徽宗崇宁年间，做一总结，虽在表面上仍崇奉“熙丰变法”，但实际上以元祐党人和熙丰党人的共同毁灭而宣告党争的终结。“元祐党籍碑”中，元祐党人司马光与熙丰党人章惇并列名其上，即不啻昭告着这一点。

后期四朝中，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由宋神宗和王安石领导的变法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直到南宋时期。

熙丰变法，在经济方面实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市易诸法，在官制方面有元丰改制，在军事方面有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对宋初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方

面的制度作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使这一时期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在思想方面，则企图以王安石新学统一思想界。后来，虽有司马光等人的“元祐更化”，力图恢复旧制，但为时不长。熙丰变法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军事改革，大部分得以延续下去，直至北宋灭亡。王学的影响，更延续至南宋前期。

由于熙丰变法时政见的不同，引发北宋最激烈的一次党争。党争的结果，使两党从政见的不合走向全面的仇视，意气用事，一意对抗而不再问政见的是非。“元祐更化”时，司马光立心尽废变法措施，执政的元祐党人不惜开百年未有之先例，将熙丰党人流放到岭南。从此种下恶果，使党争向个人报复方面发展。后来熙丰党人章惇上台，遂对元祐党人大加报复。至徽宗时，宰相蔡京与宋徽宗定“元祐党籍”，将当时尚存的两党要魁一网打尽，尽罗入其中，以遂其专权之欲，而党争便以共亡而告终结。而北宋政权，亦随之灭亡。南宋学者陈亮即说：“元祐、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夷狄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夷狄哉！”^①

三

宋人或宋遗民编纂的南宋国史，有两部：《中兴四朝国史》和《宋季三朝政要》。两书内容，涵盖了南宋九朝历史。大致按照这两部史籍，可将南宋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98 年（1127—1224）为前期，理宗、度宗、恭宗和帝昀、帝昺五朝 55 年（1225—1279）为后期。这样的划分，不免有照顾一个皇帝的在位时间不划开之意，有些不准确。按照政治发展状况准确划分，则应以宁宗嘉定元年